

浅论郑观应的教育观念

冯雷

(广州大学 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史上 一位重要的思想家, 其《盛世危言》有许多关于教育的精辟见解。他将改革教育制度看作民族自强的重要途径, 主张仿照西方广设新式学校并教授西学, 以培养人才、复兴中华。他为自己的教育思想做了大量具体实际的工作。

关键词: 郑观应; 教育改革; 西学; 教育方式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章编号: A

文章编号: 1009-1513 (2006) 03-0024-03

郑观应(1842~1922), 广东三乡雍陌人。原名官应, 字正翔, 号陶斋, 别名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侍鹤山人。咸丰八年(1858年)放弃科举, 到上海学商。此后20年左右, 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 又自己经营贸易, 投资轮船公司。光绪六年(1880年)后, 先后由李鸿章札委为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 上海电报局总办。早年虽厕身洋行, 但关心时政, 热心西学, 为洋务派出力而在思想上与洋务派又有分歧。中法战争期间, 奉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 曾只身深入暹罗与金边、西贡侦探敌情, 反对李鸿章在上海议和。因受洋务派排斥和外国公司迫害, 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打击, 便专注研究财务。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逐渐形成维新改良思想, 以“道”、“器”的关系表述旧学和新学的对立, 并以“由博返约”作为向西方学习的途径, 主张变革以御外侮, 认为“欲张国势”, 就必须改变专制, 实行议院制, 广办学校, 培养人才; 谴责洋务派“舍本图末”, “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 根本不可能抵御外侮, 强调“以商战为主”, 指出“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 莫如振兴商业”^{[1]250}, “论商务之源, 以制造为急, 而制造之法, 以机器为先”^{[1]258}, 即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机器制造业; 要求实行护商政策, 采取“收回海关、保护关税、裁撤厘金、自由投资”等护商措施。在郑观应之前, 魏源、冯桂芬等人虽然对中国近代化道路进行过大胆的初步探索, 但由于其时国门初开, 他们认识西方世界的目光还受到很大的局限。魏源关心

的是船坚炮利等西方军事方面的“长技”, 重在卫国保疆。冯桂芬比魏源前进了一步, 他不仅提出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 地无遗利不如夷, 君民不隔不如夷, 名实必符不如夷”^[2], 而且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 学习西方走富国强兵之路, 但他认为中国的道统不可变也无须变。与众不同的是, 郑观应不仅对中国近代化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而且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近代化的内容、方式和方法。郑观应的教育观是其维新变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郑观应非常重视教育。他说:“学校者, 造就人才之地, 治天下之大本也。”^{[1]11}而当时中国社会许多“蔑伦悖理”之事层出不穷, 即缘于学校不被重视。他推崇欧洲当时的教育制度:“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 其学校规制大略相同, 而德国尤为明备。学之大小各有次第……无论贵贱男女, 自六岁后皆须入学, 不入学者罪其父母。”^{[1]11}他意识到中国要想摆脱被列强欺辱的困境, 就必须兴学以普及民智, 要“尽知其成法”。郑观应论述西方教育人才有三条途径:“曰学校, 曰新闻报馆, 曰书籍馆。”^{[1]7}在此三者中他又特别看重学校的作用。他在《盛世危言·学校上》中特别提到日本及德国兴教育而转弱为强的例子, 并说:“如我国能仿俄国或

收稿日期: 2006-02-04

作者简介: 冯雷(1974-), 山东淄博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区域文化研究。

日本 衰弱之时痛除疾痼，幡然一变，各省亦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认真讲求，较盛观察所设者规模宏敞，则各艺人材何患不出？自足与泰西争强竞胜矣！”^{[11]9}可见郑观应把教育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去认识。他呼吁政府：“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才，文武并重，仿日本设文部大臣，并分司责任。”^{[11]13}由于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所以郑观应将研究重点目放在日本的变革上。他用了很多笔墨来介绍日本学校的设置情况，以期政府可以采纳之。他在论述中日之战胜负原因时写道：“用是以一海岛而胜三十倍之大国，以四十兆之侏儒而胜四百兆之丈夫，不在城高池深，炮台坚，战舰利，大炮远也，亦不在将猛兵锐，粮饷富也，而在变通新政，游学用贤，效法泰西之学校，日报，书库三大端也。”^{[11]8}可谓一语中的。郑观应还主张妇女应与男子一样受教育。他说：“泰西女学与男子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术等事。”^{[11]23}这一思想也可谓开中国之先河。他极力反对中国女子缠足，并愤笔写道：“人生不幸作女子身，更不幸作中国之女子，戕贼肢体，迫束筋骸，血肉淋漓，如鹰大戮，如负重疾，如飘沈灾。”^{[11]24}这在当时传统观念在人们心中还占据绝对统治的情况下当为惊世之笔。

在大力鼓吹建立新式教育的同时郑观应还抨击了过时的旧式教育。他说：“中国师道日衰，教术日坏，无博学通儒克胜教习之任，无师范学校以养教习之材，故为师者类皆迂儒老生，终身从事章句之学，帖括之艺。试问以五洲形式，列国政治，历朝史鉴，诸子百家，天算，动植，形声，格致之学，皆懵然漠然，不知所对。”^{[11]14}老师如此迂腐，而学生又会是何种状况呢？他写道：“是以黄口小童，入塾数月，先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继而读《中庸》，读《论》《孟》；四书读竣，又习五经。然膏继晷，朝夕从事于斯，彼其用心将为考试之题目耳，制艺之取材耳，于义理无所讲究也，于文法无所留意也。故有读书六七年徒以多记为功，不辩菽麦，故名为读圣人书，学圣人道，实则蠢愚迂谬不可响迓，腹笥空虚毫无心得，岂非可笑耶？”^{[11]14}“于是童子以读书为至苦，就学校如圜圜，对师长如对狱吏，恒思半途废业，弃文就武。”^{[11]15}在这种状况下，又如何能培养出有用之才呢？他主张对幼童要培养其悟性，不能进行填鸭式的教育以致使他们产生厌学的情绪。这种教育思想同当下教育界提倡的快乐教育何

其相似！

二

除了从宏观上论述教育的重要性之外，郑观应也对如何改变旧式教育作出了具体阐述。他建议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去教育学生。对蒙童首先以识字为主，待到认识两千字时选三百篇浅显易懂的文章歌诀供其学习，同时添识新字，待到积累至六千字时再选三百篇比较深刻的文章诵读，如此循渐渐进，用三年时间打好基础，然后再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郑观应建议采纳德国小学的章程实行分班分科教育，以保证教学质量。在提倡基础教育的同时他还提倡职业技能的培训，使一般国民不但粗通文墨计算，而且具备一定的社会需要的生产技能以自食其力，“不至流为盗贼”，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由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所以郑观应特意介绍了日本军校的设置和教育情况，以期中国政府能借鉴之。

郑观应还特别重视西学在教育中的作用。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讲西学犹如生病求医一般势在必行：“且今日之洋务，犹时务也，欲救时弊，自当对症以发药。如君夫之有危疾也，为忠臣孝子者，将百计求医而学医乎？抑痛诋医之不可恃，不求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视其死亡乎？然则西学之当讲不当讲，亦可不烦言而解矣。”^{[11]17}他认为西学要比中学更加务实所以也就更有用，其天学、地学、人学都大大有别于中学。他写到：“所谓人学者，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有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皆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此外，有剽窃皮毛，好名嗜利者，则震惊他人之强盛，而推崇过当，但供谈剧，亦实不能知其强盛之所以然，此则无本之学，不足登大雅之林。”^{[11]18}这里，他在为西学正名的同时也批评了当时国内一些不求甚解之人对待西学的不正确态度。他指出，当时中国一些学习西学之人并非是真正感兴趣去去学习，而是为了养家糊口，“今之学其学者，不过粗通文字语言，为一己谋衣食，彼自有其精微广大之处，何尝稍涉藩篱？”^{[11]20}他认为正确的学习西学之道是：“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可。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

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1]20}郑观应也主张“中体西用”,但他比前人有所创新,特别是在对西学的认识上。他说:“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则人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学也。”^{[1]20}他主张废八股、兴实学,“是以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必以重时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学,俾人人知所趋向鼓舞而振兴之。数年之后有不人才济济者,吾不信也。”^{[1]21}在郑看来,学西学是中国自强的出路之所在,而八股取士的制度则是兴西学的主要障碍。他说:“无论一材一艺,总期事实求是,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而中国文士专尚制艺,即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得第,不工此者不得第。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消磨于无用之时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安国家乎?……一旦业成而士,则又尽弃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1]27}现实的功利逼迫着学子们穷经皓首,却研习些无用之学,实是可悲!虽然当政者也采取了一些方法去弥补这些不足,但结果于事无补。如今中外大臣保举贤能,可是却被他们当成弄权之工具,岂不哀哉?郑观应建议分科考试,中西并重,公平取士,如此方能解决上述困境,使西学之兴有一个基础。

在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实用人才方面,郑观应也做了不少宣传鼓动和具体的实际工作。在招商局任职期间,他把买来不合商船之用的船改为教练船,先招学生若干名学习驾驶诸法,继则正式成立驾驶学堂。在总办汉阳铁厂时,又创立机器书院,招收的学生上午读书,下午入厂学习机器。他自己也成为我国较早提出设立结合机器操作实践的半公半读学校的教育家。1917年以后,他还担任招商局公学的住校董事兼主任以及上海商务公学的名誉董事等职,主持或参与学校的实际工作,以实际行动为广兴学校、培养人才、开通民智、研究学术树立了榜样。可以说,郑观应是一个务实求真的人。他一生致力于探索“富强救国”、全面实现近代化的道路、方式和方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气还未大开的时代里,郑观应所言所行,不仅激励了同侪,而且也鼓舞了来者。

参考文献:

- [1] 郑观应. 盛世危言 [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7.
- [2] 赵靖, 易梦虹.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上 [G]. 中华书局, 1980: 334.
- [3] 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 下 [M]. 光绪二十四年重印本, 39.

On Zheng Guanying's Educational Ideology

FENG Lei

(History Dept,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Zheng Guanying was a very important thinker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is *Words of Warning in a Great Age* contains many penetrating insights. He thought reforming the educational system w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and he advocated modeling on western schools and imparting western learning so as to train talent and reinvigorate China. He also did a lot concrete work to fulfill his educational ideas.

Key words Zheng Guanying; educational reform; western learning; educational methods

[责任编辑 文俊]